

新观察

边地书写及其异质性

——当代广西乡土叙事探微

曾攀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广西文学始终与国内文艺的大思潮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共振关系,其中难以合流与化约的剩余物,便是异质性的所在。可以说,当代广西的乡土叙事在将自身投入国族乡土变革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显露出偏倚或超离的质地,并从内在文化土壤生长出新的块茎,在边缘化与同质化的双重夹缝中确认并表达自身,从边地出发而又试图突破边缘的困囿,真正于叙事结构中熔铸一种异质性的存在。广西文学不仅分享了文学的形式革新与文学潮流,还开掘了内部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加之文化突围过程中不断展示的先鋒话语,最终实现在语言、形式、伦理上的立异标新。在我看来,当代广西乡土叙事所突现的边地书写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二重参照、善恶的俱分熔炼以及灵魂肉身的歧异分合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边地的异质并不仅仅局限于边缘之境本身的价值显示,恰恰相反,是要突破边地的畛域,甚至于取消边缘与中心的二项对立,进而重构一个文化的镜像与象征,真正面对并处置广西、中国以至世界的命题,直面现代主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归处,思考传统/地域/民族文化的固有与开新,以“异质”为标识性出发点,从边地走向大境界、大天地。

T.S.艾略特指出,真正与传统建立关联的写作,并非可以轻易达成,不仅需要形成“对于永久和暂时合起来的意识”,而且需要通过创造性的书写,推动“新与旧的适应”。当代广西的乡土叙事便是通过异质的语言形式,借由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性因素的勾连介入,使传统的乡土世界得以完成当代重构。陆地的《美丽的南方》《瀑布》《故人》等小说,以乡土广西为核心牵引大历史的风波与风云;李栋、王云高的《彩云归》,李英敏的《椰风蕉雨》《壮嫂》,陈肖人的《黑蕉林皇后》等透露出来的浓郁的民族气息既寻常普通又充满奇崛神秘;韦一凡的《劫波》《姆姥韦黄氏》,潘荣才的《板雅坡上》,常弼宇的《歌劫》,梅帅元的《红水河》等,将广西本土的寻根文学探索推向深入;李逸的《河妖》《蓝蚂蚁》《伏羲怪猫》,张宗斌的《山鬼》《大鸟》《流金的河》等,诡秘丰富的地方性叙事着上了浓重的先锋色彩。以至上世纪90年代末及新世纪,当代广西乡土叙事中的异质性愈加显豁,后现代书写不断解构着既定的乡土景观及其价值系统,城乡二元化/对立式的聚焦叙事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形态,隔居其间的人们既疏离怀念边地乡土,又不得不遭受身心异离的精神处境;对城市满怀向往,同时又难以抵御其中销金蚀玉的现实冲刷,如是之双重疏离,构成了边

地叙事的精神与文化张力。

乡土叙事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世纪的边地广西,如何创造新的可能性与异质性,成为甚为迫切的命题。东西的小说有如一根硬刺,能够刺破生活的与情感的虚伪,穿透温情脉脉的现实假象,直视命运的悲剧与苦难。在东西那里,城乡之间的转轨所造成的文化的落差,形成了一种时代的隐喻,不仅意味着每个个体情感结构的变动,更代表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的想象性转圜。东西小说的异质性体现在生命的嫁接与意义的拼贴上,《纂改的命》将乡土的与底层的生命拼贴接入城市的与上层的轨迹之中,揭示了新世纪前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血泪史。在《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中,东西展示了对乡土人性及其言说形态的探索,形而上的“语言”之思不仅塑造了人的生存和交往方式,生存与死亡、存在与缺憾等命题不断被触及,尤其在城市的生活延展与乡土世界的自洽存在中,东西寄托了更为深沉的思考。

李约热的《李壮回家》以叙事者“我”的视角,讲述弟弟李壮离乡/返乡的精神历程,小说的最后,当李壮中秋归来时,家乡已不复存在,而城市也击垮了他,在现代都市文明与故乡精神崩坍的双重冲击下,人物精神的整体性荡然无存。此外,李约热的《依城逸事》还提供了一个城乡二律背反的叙事框架,人性与人心之不可推测成为了现实常态,然而小说最终还是通过精神的强度重新整合地域和文化的偏差。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以“我”的视角,将丧妻的陈村及其子女晓雷、晓雨等线索交织起来,乡土世界无论是人际还是土地伦理,都遭遇了沉重的危机。在《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小说中,完整的人性被拆解为零落的碎片,法律与公正被潜在的罪罚所代替,然而在此过程中,现代性遭遇的阻隔不断在乡土与城市的二律背反中呈现出难以取消的存在。光盘的《重返梅山》通过爷孙两代人的参照性叙述,让来自城市获得了商业成功的“我”回到传统乡土,与内心的道德标杆爷爷及其革命历史相遇并产生深切认同。

可以说,广西作家在面对城乡之间的二项分化时,表达出了因袭尤深的乡土价值系统在现代话语的冲刷下略显疲态与倍感不适的颓败感,不同的价值参照系统在当代广西的乡土书写中得以并置而存,呈现新的现代性姿态,由此分化出异质性的精神旨向和叙事伦理。可以说,城市与乡土的各自延展及其在交叉交互中引发的精神坍塌与重建,成为了边地叙事新的乡土镜像。

广西的乡土叙事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上岭

村、野马镇、蛋镇、红水河、鬼门关等,表现出区域重塑与文化再造式的切割,然而事实上彼此又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勾连。不仅如此,当代广西乡土叙事还往往引入外部的他者视角,构筑新的参照系,城乡及乡土内部之间形成合力,成为了人物主体命运新的精神坐标。从内部看,传统与现代的交相冲击对于边地乡土乡民的人性善恶,往往通过苦难的关切和悲悯加以表达,在此过程中,善恶不是截然区隔的,也不是简单的法律审判和道德评断,而是乡土伦理的现代映射,是文本世界内部的价值取向,不仅关涉人性命运的艰难抉择,更牵引出新旧时代交替中的挣扎和坚守。

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中,在不同的价值判断系统尤其是审判关系之中,乡土世界的伦理指向开始变得模糊,生死由谁定夺,善恶何以区分,小说在可疑与可信之间摇摆不定。《天等山》《寻枪记》《我们的师傅》等独具一种浓郁的民间草莽气,个中人物时常被置于法律的、政治的与商品经济的多重冲击之中,通过传奇性叙事呈现当代乡土世界的伦理困囿。映川的《狩猎季》讲述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李绿、周启等人与处长董固业之间的官商勾兑,他们结伙上云霄山猎鸟,而与他们相对照的,是李绿的农民舅舅舅妈、作为鸟类保护者的表弟许宽道以及高校教师苏玉石等形象,城乡之间形塑了两种人物形象序列,以此完成价值的与文化的批判。王勇英的《水边的孩子》《弄泥小时候》等作品,将善美的乡村风情与纯粹的孩童视角相融汇,形构了边地乡土的新世界。

在现代性的视域下,乡土的精神伦理更显得模糊,但是模糊不代表不可区隔,恰恰相反,模糊本身意味着能够不断辨析着原本混沌的所在,当代广西的乡土文学将丰富复杂的元素纳入考量的范畴,由是而产生种种难以抹除与归化的异质性。也就是说,善恶不是简单的道德、法律断定,必须掺入更为多元的价值序列之中,不断与之周旋、与之商榷。东西的《后录》、凡一平的《撒谎的村庄》、李约热的《我是恶人》、朱山坡的《儒夫传》等作品,将谎言与真相、勇毅与懦弱、善良与邪祟之间的复杂纠葛展露无遗,但又并不完全沉溺其中,而是对大的历史时间与城乡空间加以审视,或解构,或翻新,不断实现超越与克服既定的价值范畴,由此构成边地乡土的异质性叙事。

三

在城乡、善恶中不断周旋的人物躯体/灵魂间的交流互哺,同样成为了当代广西乡土叙事在聚焦人物主体内部时的一种文化表达。现代性叙事在边地表达中不仅体现在表面的意象、地景、生活形态,更是切入到人的情感和意志的深层,窥探他们的精神焦灼与现实期冀。田耳的《金刚四



曾攀

当代广西乡土叙事所突现的边地书写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二重参照、善恶的俱分熔炼以及灵魂肉身的歧异分合之中。

四

灵魂与肉身寄寓乡村和农民,将小说推向更广阔也更深邃的境域。

不得不说,当代广西乡土叙事蔚为大观的异质性景象,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更非局限于简单的叙事策略和话语姿态,而是始终凝视当代广西以至中国最为迫切的命题,啃一啃那些现实中难以下咽的骨头,正视不可直视的幽深曲折的人心人性。广西文学固然并不否认自身的边地与边缘处境,也坦然地面对城与乡、善与恶、灵与肉等现实遭际中的弥合分裂。萨义德曾提出“边缘人”的概念,其既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也是文学叙事的伦理姿态,如是亦构成了当代广西乡土叙事的精神核心:立于边缘以形成冷峻的审视,处于边地而建构批判的视野,毫不回避社会的与文化的当代性难题,将其中不可取消的共谋与纠结、异见与分化、退让与隐匿和盘托出。

可以说,在当代广西乡土叙事的内在格局中,无论是革命历史、寻根探索、先锋实践,还是当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新现实状态,边地的书写不断在探询不可复制的异质性存在,这是边地文学在左突右冲的精神求索中的文化价值所在,那些野性横生、纠葛矛盾、抗斗争争、百折不回的形象,且歌且泣地在悲欢苦难中追及分裂或完整的自我,同时又在灵魂的妥协与进取中投入外在世界的变革浪潮。



■第一感受

梁豪是一个“90后”作家,年龄其实并不重要,但是年龄问题体现出来的往往是时代的痕迹和历史的记忆,对梁豪来说,时代的痕迹和历史的记忆其实不是特别清晰,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纵深的历史的跨度,而是空间的断裂和延续。他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和徘徊以及因焦虑产生的莫名情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在于乡土文学的书写和繁荣。鲁迅、茅盾、赵树理、李劫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农村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描写,留下丰富的财产,也为后人的写作提供了可借鉴的优质资源。当代文学是以“农村题材”的方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新纪元的,柳青、路遥自不待说,莫言、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都是为乡土立传的。梁豪的小说集《人间》里的部分作品也是从乡村、从家族的故事出发,不以靠谱的叔叔这样的人物登场,以他们的欲望滋生去折射在现代性冲击下传统的破裂和乡村文明的崩塌。

对城市的书写是近4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滥觞的20世纪80年代,其中有一个命题就是对城市的书写,但由于当时城市化的进程刚刚开始,那时候的城市在小说家的笔下更多的是西方伦敦、纽约、巴黎的投影,情绪固然是迷惘或愤怒,但城市的框架依然是异域的,一些不成功的小说被称为“伪现代派”,就是一些作家不适当地把西方的情绪装在大集镇一样的小城青年身上。

到梁豪这里,中国城市化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虽然城

城乡生活的双面书写

王干

市的内核依然充满乡村的气息,但城市本身与乡村的冲突已经蔓延到伦理上、价值上、心理上,成为小说创作的最佳资源。梁豪对城市的书写并不是有意为之,或者追赶某种潮流,而是来自内心的波动和激荡。长期城镇生活的积累,长期南方生活的滋润,让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书写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复杂的情绪在小说里会转化为一种典型情绪,可以称之为一种城乡的“双面”写作。

对一个城市的书写是现代小说常见的方式,19世纪40年代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就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巴黎的秘密》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30年之后,法国卢昂出生的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宣告现实主义巨著的问世,这也是一部以巴黎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北京作为一个中国地标的城市,近百年来也是被人们反复书写的。老舍的京味小说,奠定了书写北京的史诗性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小说的流行,也为北京书写补充了新的内容。京味小说的特点就是北京人写北京,以本地人的内在视角来展现北京的文化地理和人文风俗。而“另一种北京书写”则是外地人来到

北京对这座城市的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邱华栋的长篇小说《城市战车》描写一群流浪艺术家在北京的奋斗和苦闷,令人耳目一新,至今读来仍有价值。之后,不少的青年作家都通过外来者的视角来观察、体会、描写北京这座变化、动荡的城市。石一枫虽然是北京人,但他的小说时常引进“外乡人”的视角,《世间已无陈金芳》《玫瑰开满麦子店》等以北京“城乡接合部”为系列的小说,也写出了城市与乡村“接合部”(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和情感意义上)的巨大感和反差。

梁豪的《麋鹿》《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小说都属于对北京进行正面书写的作品。《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属于另一种北京书写的系列,主人公黄迪在北京打拼的故事显然没有邱华栋笔下的青年那么惨烈奔放,但感受到的压力比当年有增无减,而那个大鳄廖桦的出现,则是文化霸权对年轻一代的青春榨取和压迫,让黄迪和姚凯薇的爱情和理想迅速破灭。这是一篇充满边缘与中心对立的人生痛感的小说。

而《麋鹿》里的边缘又让“中心”感到尴尬。小说讲述的是北京人摄影师老齐和来自云南的“粉丝”卢莹的故事,有点像夕阳红的老年爱情故事,这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可以说是

非常生疏的领域,但作家描写两人细腻而微妙的情感冲突松弛合适,一些细节也颇有生活气息。梁豪的本意不是去展现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而是去挖掘这样情感故事背后的文化差异,来自乡村的女性为什么比老齐要获得更多的自由感和价值感,而身居北京城多年的老齐,反而在他的一个乡下学生面前显得局促,甚至对她产生了某种依恋。梁豪如果只是停留在城乡的价值和心理的冲突上,还不能超越他的前辈们的书写,他还在寻找。在《麋鹿》这篇小说里,正如他取的题目一样,是人物之间的“四不像”的关系。老齐和卢莹,是师生关系,还是情人关系?是朋友关系,还是夫妻关系?他们两个人没有搞清楚,作家在叙述时,也透露出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就是梁豪对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人物关系的一种把握。有了这种把握,梁豪的写作才有可能在小说创作中摆脱前人“影响的焦虑”。

梁豪的创作和自身的生活状态有着某种联系,他从南方来到北方,南方的视角和经验影响到他对北方的叙述,他从家乡来到北京这个“他乡”,因而在小说里时不时地带着某种“对照”的思维,这让他的小说带有某种复调的潜质:和同时期的“90后”作家相比,他写的北京比生活在北京的作家要“复杂”一些;他的乡村和那些纯粹的乡土作家、同时期的作家比起来,低调也要暧昧一些,这是他的长处。

梁豪的小说注重生活实感,描写细腻贴切,尤其喜欢抓住细节来渲染气氛,让人物内心的苦痛变得尖锐而持久。如果持续不断地书写下去,不断地丰富自己,也许会写出像《巴黎的秘密》那样的经典。

Advertisement for 'Grassland' (草原) magazine, featuring a table of contents with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